

■玉渊杂谭

猴子，你是春晚搬来的救兵吗？

文·句艳华

最近网友们在忙着一件事，就是为六小龄童上央视春晚签名拉票，搞请命，搞得如火如荼，一浪高过一浪，致力于让童年共同的偶像亮相。中间还夹杂着春晚吉祥安康形象的公布，韩美林的水墨版和3D立体版一褒一贬，大家为猴子的形象操碎了心……春晚，这个之前令不少人生厌的话题突然就被救活了。

猴子真是春晚搬来的救兵啊！看看观众们给春晚策划得多么细心周到，构思到了细节，最好做开场节目，大猴小猴落玉盘那种，或者，等着零点压轴出场，来一句：俺老孙来也！还有人甚至说，假如以上存在困难，哪怕让老孙露个脸，嗑瓜子也行，否则12年以后，六小龄童可就古稀之年了……怀念之情殷殷切切。

央视春晚很久没有这么受宠了，幸福来得太突然，群策群力出主意这样其乐融融的场面，多么天价的广告费也未必买得来。连六小龄童本人都表示，这种全民呼吁一个人必须上春晚的情况，实属少见。春晚得感谢下猴子，然后顺应民意，皆大欢喜。这不是难事，美猴王长幼通吃，人畜无害，形象健康，求真务实，前12年，前24年，他都曾经英姿飒爽地出现在春晚舞台上，一慰众情，岁月无情猴有情啊。

没想到人们的呼声却“雪落黄河静无声”，至今仍是一头热。春晚剧组的态度是“傲娇”的，导演伸出一根手指“指出”，这是某电影的炒作，“知情人士”一顿义正辞严：这是起哄，是煽动网络绑架导演，怎么全民都想操纵春晚！翻译成大白话的意思就是，春晚是不会听你们的，上什么节目，用什么人，你们说了算。这有点不对劲。号称“年夜饭”的春晚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阳春白雪，它是实实在在办给“全民”看的文化产品，需要“讨好”的，自然首先是主持人人口口声声所称的“亲爱的观众朋友们”。是掌声还是吐槽，是点赞还是

拉黑，都是他们说了算，不是春晚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，更不是执掌大权的导演。观众喜欢美猴王，但观众并不是猴子，倒是春晚应该把自己放到猴子的角色上。春晚要想办好，换导演花经费拉广告是其次，重要的是不要忘了“亲爱的观众朋友们”，摸着他们的脉，踩着他们的锣鼓点跳舞。这些年来央视春晚人气急转直下，就在于早已忘了自己和观众之间，是怎样一个关系，到底谁为谁跳舞的问题。就比如今年的导演吕逸涛很早就“表示”：“春晚怎么做才能让大家都满意，其实这就不大可能。现在的观众，口味太重。”这就是一个例证。追求让更多的观众满意，难道不应该是春晚的最高目标吗？观众的口味是什么？怎么个重法？春晚是否了解过？或者，观众像今天一样，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口味，春晚为何有了一付衙门的气质，缺乏起码的回应和互动？不尊重观众参与热情和需求，办不好就说是观众不配合，观众肯定就不陪你玩了，猴子也救不了你。

胜利，不是征服别人和世界，胜利是征服自己。

迁

总编辑通知我，因科技日报版面调整，“朝胜观察”专栏“搬迁”到本报最美丽的文艺副刊“嫦娥”版。仍然每周一期，周六出刊。按照“嫦娥”的发稿程序，搬迁首篇应该在立春这天发稿，多么吉利的日子啊！心情一激动，给老总回了一个微信：“敬告观察犹自珍，蒙兄垂青细安顿。一飞登月伴嫦娥，老记因之苟日新。”

“一事能狂便少年”。此刻，朝胜确怀一颗少年之心。26岁时，朝胜因写诗而加入了安徽省作家协会。同年，还当选为安徽省新闻学会理事。一支笔写诗，一支笔采访。春风得意马蹄疾啊！万没有想到，好像就从那年开始，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告别诗歌，每一步都跋涉在空气越来越稀薄的新闻之巅……

就连这个小小的专栏“朝胜观察”，也是在十几年前因新闻而生。只是，心有不甘，在这个“自留地”的边角旮旯里，总想留几棵文学的小花小草。对此，编辑们总是会心一笑，时不时地还给那些不起眼的花草草淋上一些甘露。更有甚者，有几回技痒难熬，居然在新闻版的专栏里以散文诗写作叙事，好心的编辑们大约背后感叹了句“可怜的”，也都绿灯放行了。今天，朝胜居然如蛮牛般堂而皇之地闯进了“嫦娥”的百花园，恨不能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。只是不知，26岁时那支写诗的笔，如今锈蚀成什么模样了？

就在朝胜欢天喜地的忙于专栏搬迁之际，远在冰冷的南极，一位英国的探险家也在“搬迁”。他一人拉着一150公斤的雪橇，独自徒步穿越南极大陆的探险。这生死未卜的旅程，对于一位探险家来说，那诱惑是无法抵御的。出发的第一天，他向自己的家人、后勤团队，向全世界的人们这样写道：“这是现在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。”

经历了69天的跋涉，独自步行了1469公里，就在即将到达终点、只剩下最后48公里的时候，却因为体力到达极限而倒下。在帐篷里躺了整整两天之后，他终于决定放弃，发出了求救信号。

最后的一次通话里，他的声音听起来依然很坚强，很平静，但是已经带着一丝悲伤和失望。他说：“很悲哀，这是我这次行程的终点，我是如此接近我的目标，但我已经用完了时间和体能，没有办法再前进任何一步，没有办法完成我的目标。”

他说：“我所向往的高峰遥不可及。但是，在这个我热爱的地方，我一个人度过了70天。我将舔舐我的伤口，等待着时间让它们愈合，我会和我的失望达成和解……我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喝一杯热茶，吃一块蛋糕。”

遗憾的是，生命却不肯与灵魂和解。他终于没能享用那一杯热茶、一块蛋糕，两天后55岁的探险家离开了人世。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：英国探险家亨利·沃斯利。

许多人为他遗憾，只要再走48公里，他就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依靠外力帮助——不需要狗拉雪橇、不需要飞机空投补给物资、不需要队友同行——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穿越南极壮举的人。

朝胜却认为不必遗憾，胜利不是在48公里之后。亨利·沃斯利从迈开的第一步开始，就胜利了！胜利，不是征服别人和世界，胜利是征服自己。况且，就算少了那48公里，他仍然是独自穿越南极的世界第一人。

他死于中国“立春”的前十天，他独自完美地完成了一次生命的“搬迁”。相逢何必曾相识，一个素昧平生的中国记者，把他请进了“嫦娥”这块开满鲜花的草地上，请他盘腿坐定，悠闲地喝着全世界最好的中国热茶、品尝着刚刚出炉的蛋糕……

请他谈谈南极那69天的风雪、1469公里的每一步跋涉。

你走了，南极还在。你带着南极的风暴走了，南极却留下了你用脚印写下的故事。也许明天，也许千年。一层一层的冰雪封存了你的脚印，就像归入了地球的档案。

人不知而不愠，何必计较什么流芳千年。55岁的生命，和南极的一场生死之恋。嗨，哥们，你太伟大了——

南极在，你就不远！



■行吟泽畔

在印度时间里体会“慢”幸福

文·胡一峰

“带上止泻药”，当得知我要去印度时，好几个朋友对我这样说。虽然我对自己肠胃抵抗力颇有自信，但还是把一盒“蒙脱石散”装进行李箱，欣然启程了。这次印度之行时间短暂，停留之地却有四处，艾哈迈达巴德、那格浦尔、赖布尔和孟买，从地图上看，四个城市都在印度中南部，尤其是赖布尔，鲜有中国人之足迹。1月20日上午，我们一行人抵达了此行的第一站，艾哈迈达巴德，这里是甘地的故乡，被称为“中国的广东”、印度经济发展的奇迹。接待我们的印度朋友卡秀儿·贾瓦德有些遗憾地告诉我们，艾哈迈达巴德所在的古吉拉特邦实行禁酒令，在这儿不能“ganbai”(干杯)。我素不喜酒，听他这一说，反而对这座并不怎么漂亮的城市顿生些许好感。

在印度，动物和人走得很近。白的、黑的、花的牛悠闲地在街上散步，偶然又走到路边的垃圾堆里翻找食物，在中国分派给牛的那些力气活儿一律由骆驼或大象承乏。在中国，牛的眼睛里总是流露出一股淡淡的哀伤，老牛尤其如此，但它们的印度同胞却显得很愉快，遇到熟人时，还会乖顺地伸出脑袋任其轻抚致意。而在环境清幽的甘地故居，一棵大松树下，一群花背小松鼠跳到离游客不足2米之处吃东西、嬉闹，任人轻呼、指点、拍照，毫不惊慌。

印度的大街上，摩托车、电三轮来去如电，就像早些年中国南方的某些城市一样，但我却觉得，印度人的内心宁静如水。到那格浦尔那天，正赶上当地举办“佛教音乐节”，空旷的“佛教复兴广场”临时搭起了席棚，约莫两千多个位子座无虚席，一位干瘦的老者神采飞扬地在台上演讲，听者凝神安坐，秩序井然。演讲结束后，中国的艺术家们举办音乐会，来听的人更多了，棚子外也站满了人。乐器是中国的，箜篌、琵琶、笛子和二胡，演奏的大部分是中国民族音乐，《喜洋洋》《花好月圆》《二泉映月》《夕阳箫鼓》《龙船》，但印度朋友依然听得认真，并不时报以掌声。这样的音乐会一共举行了三场，并无组织观众，大家免费入场，来去自由，但令我感叹的是，绝少中途离场、接打电话、大嚼零食之人，每场结束后，场地十分整洁，几乎不用清扫。

在一份旅游攻略上曾读到过，在印度遇到乞讨的小朋友切不可滥施慈悲，否则受惠之乞儿呼朋引伴，无止无休。但除了在孟买，我未遇到此种情况。倒是在音乐会现场，常有十岁左右的孩子，彬彬有礼地走到我面前，睁着深眼窝里的大眼睛，伸出黝黑的小手来，说，您好！您来自中国吗，您贵姓？其中不乏衣衫破旧者，一望而知来自中下阶层的家庭。但他们对于外国人的到来以及这些外国人带来的乐器和音乐，做到了我们读小学时经常被教导的，见到外国人，不卑不亢、不围观不尾随，体现出一种自在的气度。

很早以前，就读过奈保尔的《印度三部曲》，临行前，又找出来翻了翻，本以为奈保尔的时代过去这么多年，印度人慢的习惯或许有了改变。及至到了印度，才发现奈保尔并未过时。又或许对“慢”的改变已经在印度发生了，但改变本身却被“慢”所熏染，所以在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外人看来，依然“慢”得令人难以忍受。音乐会有一些中印合奏的曲目，当我们的音乐家希望准确了解印方的演奏细节，以便演出时配合得更好时，印度朋友总是摆摆脑袋，轻松地说，“即兴就好”！而预定4点开始的走台，往往到了5点还不能开始，当我们为7点的演出能否如期开场忧心如焚时，印度朋友却满脸“有谱儿”的神色，果不其然，演出到了8点才正式开始，观众也很有默契地在8点才姗姗而来，惬意地盘腿坐下。开场既然推迟了，结束自然也相应推迟。结束后，观众们又围到台

上来，和艺术家们拍照合影，连说带比划地交谈，兴致耗尽才慢慢散去。我忽然想起《世说新语》中有一则故事：王子猷居山阴，夜大雪，眠觉，开室，命酌酒，四望皎然。因起彷徨，咏左思《招隐》诗。忽忆戴安道，时戴在剡，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经宿方至，造门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，王曰：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向被视为魏晋风度的精髓所在。而魏晋时，源于印度的佛法已然东传，在上层尤有市场，知识分子中随之而行的风气，或许也正受着印度文化的影响呢。

我觉得，这世上真有一种“印度时间”。印度与北京的时差为两个半小时，现代科技十分发达，飞机一落地，手机已自动调整为印度时间，但我说的“印度时间”，和时钟没有关系，是一种内在于精神气质的状态。早年间，为了争分夺秒搞建设，我们一度在暑期推行过“夏令时”，也就是把手表拨快一个小时。其实，手表可以任人拨弄，是因为手表上的时间，不过是人类为生命节奏立法的努力罢了，但随意拨弄的结果，有时反而限制了人性在天地间的自由挥洒，给人生带来不少烦恼。而生活在“印度时间”里的人们，少了一份限制，多了一份安宁。他们的物质生活或许还不富足，却每天在精神世界里体验着世代相传的“慢”幸福。我以为，这种状态在哲理层面的发展，大概就是庄周喜谈的“坐忘”。

到过中国多次的卡秀儿不止一次对我们说，他很羡慕中国，因为政治和文化等各种原因，印度无法像中国模式这般快速发展。而在我想来，印度固然要发展，但最好不要破坏“印度时间”给人们带来的那份满足，不要让牛儿失去家园，不要让松鼠充满警惕，不要让人心失去秩序，更不要让孩子失去淳朴、礼节和尊严。我知道，经济的繁荣与生活的幸福，如水和舟之关系，可载之亦可覆之，而取舍存夺之道，又非我等俗夫所能参透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不会印度语，耗费二十年青春所学的英语又早已完璧归赵，即便有所参悟，也无法告诉卡秀儿了。没奈何，只好做出很印度的样子，似是而非地摆了摆手。



迎春图(国画) 徐湛

■乐享悦读

茶馆，一道熟悉而陌生的城市风景

文·严杰夫

说起茶馆，许多中国人或许会产生很多回忆。有一种人，对茶馆情愫更为特别。譬如汪曾祺、鹿桥这些西南联大的学生，在他们的记忆里，“泡茶馆”是他们在抗战时期远赴昆明求学的岁月里，获得的一种格外珍贵却难忘的经验。

出生于成都、后拜师于著名汉学家罗威廉的学者王笛，对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成都茶馆，曾进行过深入的梳理和研究。在这一基础上，他用文字为读者还原了那个时代成都城里茶馆的模样，以及它们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。这就是《茶馆：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，1900—1950》里的核心内容。

成都茶馆的发展较其他中国城市繁盛，甚至成为当地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色。正如民谣说，“一城居民半茶客”或“茶馆是个小成都，成都是个大茶馆”。有数据显示，当年仅五十万上下人口的成都城里，就有差不多600家茶馆。可以想见当年的茶馆在成都人的生活中曾经占据了怎样的地位。

即使在今天，成都的茶馆对于外地游客，也仍是一道特别的“风景”，人民公园鹤鸣茶馆的“采耳”服务，更是被写入了大众自由行的攻略，被看成是成都行的必选项之一。所以，成都的茶馆早已不止是社会学家的考察对象，也成为文学家笔下热衷描写的景色。在李劫人、舒新城等知名作家的作品里，成都茶馆都曾作为重要的场景而出现。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年轻时访问中国，都特地跑到春熙路茶馆里亲自体验了一把。

也因此，王笛对成都茶馆的考察和研

究，或许更能凸显茶馆在传统中国生活中曾经彰显过的价值和作用。而这对于我们去理解中国城市里曾风行过的“茶馆景观”，也就提供了极大的帮助。

茶馆最重要的功能，当然就是休闲和娱乐功能。这种休闲娱乐，不仅是为客人提供放松休息的场所，更重要的是，茶馆往往成为人们的信息中心。王笛写道，“在茶馆，人们谈论各种问题，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外交，其内容涉及社会状况、习惯和文化……”。从作者的描述来看，当年的茶馆类似于网络时代的论坛等社交网站。在那个年代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获取资讯和信息最主要的渠道就是茶馆。

除此以外，那个年代，茶馆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还起着其它重要作用。它是“市场和交易场所”，买卖土地或其他商品等许多生意，就在茶馆里正式交易；它也是“劳动力的市场”，许多劳工在那里待雇；它有时还是社会组织、行业协会的集会地点，许多茶馆本身就是行业协会乃至于社会组织开

设的，譬如绸商有绸商茶馆、纱商有纱商茶馆，而清代以来著名的半黑社会性质的袍哥组织也大多有自己的茶馆；它有的时候还会成为民间仲裁的“法院”，为人们解决纠纷，这在成都被称为“吃讲茶”，民国政府官方权威出现弱化时，“吃讲茶”事实上是成都人十分重要的仲裁途径。

当然，除去上面这些功能，成都茶馆在成都人的生活中还发生着其他的重要影响。因此，茶馆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。正是因为有了茶馆这样的公共空间，传统中国人的个体日常生活，在城市里通过一种新的组织方式被联系起来，以至于那个时代的普通都市人都很难摆脱茶馆的影响。

茶馆的这些功能自然也被当时的掌权者所发觉。于是如何利用茶馆，去控制和影响社会基层人民的行为举止，也就成为当时“公权力”实施所面临的重要课题。王笛的研究告诉我们，有的时候，茶馆和掌权者会站在一起，来帮助引导社会